

我的乳名叫进国

□孙秀斌

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乳名,一个饱含着亲情的名字。乳名,又称小名、奶名,是父母给孩子起的昵称。人无论活多大年龄,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乳名,就像不会忘记自己的父母一样。

前进的进,国家的国,引申出的意思就是前进的中国。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。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,一张蓝图正在绘制。我的出生,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幸福,他们为能我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而感到自豪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给我取了进国这个乳名,其寓意和拳拳之心是不言而喻的。

父亲那时是一名年轻的军官,驻守在舟山群岛,而母亲则是一名勤劳善良的胶东农村妇女。父亲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,像千千万万名解放军战士一样,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,才换来了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。父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日益强大啊!就这样,我拥有了一个催人奋进、令人期盼的乳名:进国。

我的童年是在海岛部队度过的,是在父母及叔叔阿姨们一声声“进国”的呼唤中成长的。我稍大一些的时候,要报名上学了,父母说要给我起个学名。为啥不叫我进国了啊?我不解地问父母。你要按老家的辈分起一个学名,不能忘了“根”啊。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我的。父亲是极尽孝道的人,在他看来,忠孝应该两全。不过,尽管我有了学名,可在部队里鲜有人喊,我也觉得乳名更使人感到亲切、温暖。

父亲由于身体的原因,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光荣转业了。我们全家来到鲁南的一座小城,住在一个大杂院里。在大杂院里,邻居和小伙伴依然喊着我的乳名,好像我没有学名一样。其实,那时和我一样有着类似乳名的小伙伴还有不



少,像什么建国、卫国、兴国等等。我们互相喊着,过着快乐时光,用自己的乳名祝福着伟大的祖国。

没多久,“文革”爆发了。停学停课,全国大乱。几年后,我初中没毕业就被分到了工厂,那一年我才16岁。当了工人的我,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骄傲。那时我认为自己已长大了,不应该再被人喊乳名了,可偏偏儿时的玩伴有认识我工友的,不经意间将我的乳名传开了。于是爱逗乐的工友,便常常喊我的乳名。我都工作了,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,你们还能这样喊我吗?我对一位常喊我乳名的工友表示不满,于是千方百计打听人家的乳名,可人家没有,这咋办啊?灵机一动,我给他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。可他的外

号没喊起来,我的乳名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,那几年让我甚为恼火。其实,这种善意的逗弄、诚挚的问候、友好的亲昵,当时我怎么就不理解呢?疯狂的日子竟使我迷失了自我。

多年以后,我调离工厂,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。工作变动后,同事之间喊我乳名的没有了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父母的早逝,亲朋好友中能喊我乳名的更是少之又少了,但不知咋的,我却时常觉得有一种失落感。每当国庆来临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我的乳名,想起我远在天堂里的父母。我知道,那是镌刻在心底的记忆,永远不会尘封。我想告诉父母的是:儿子很好,祖国越来越强盛,越来越美丽,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,向前进!

名家言

巴桑与多吉

□简默

到林芝走下飞机,巴桑已经手捧哈达在候机厅迎接我们了。他是我们此次山东作家交流采风的随行导游,也是我们进入西藏正式接触的第一位藏胞。

他坐在我前排。我与他攀谈起来,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。他今年31岁,19岁考入西藏大学历史系,攻读佛教研究专业,会说藏、汉、尼泊尔、德语。他毕业后先是在毗邻尼泊尔的扎木口岸做翻译,后转行干导游,至今快6年了。每年4至10月份,是他最忙碌的时候,他接团队,也带中外散客,足迹遍及川藏沿线。11月到次年的3月,西藏进入冬天,游客稀少,他无事可做,就待在家里,陪伴阿妈、妻子和女儿。他早年丧父,阿妈一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他兄妹三人。他的妻子来自日喀则,负责在家中照顾阿妈和女儿。他的女儿叫格桑次仁(意为“幸福宝贝”),刚满5岁,女儿满月后就被他们背去了寺庙。他们一家每天都要做祷告,早餐必定以糌粑和酥油茶为主。

听了这些,我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继承了藏族传统文化,有自己坚定的宗教信仰、保持着较为纯粹的藏式生活习惯的藏胞。

现在想起巴桑,有两件事叫我印象深刻,一件是我们翻越5013米的米拉山口后,本想在沿途半山腰上的一户游牧藏胞家中做次家访。待我们下了车,了解到这户藏胞家中只有一位老阿妈领着三个孩子,她的儿子和儿媳都去放牧了。我们不便打扰,失望地转身离开时,一条大黑狗狂吠着凶猛地扑了上来,同行的一位作家慌忙上车躲避,不小心腿磕上了车门。这时巴桑冲着那狗用藏语怒吼了一声,它仿佛听得懂似的,乖乖地止步,夹尾退回了。还有一件是我们从拉萨驱车游览完纳木错返回途中,在一个小镇停车如厕,我看到公路边卧着两头披红挂绿的白牦牛,顺手端起相机对准它们拍了一张。不料恰好中了个别藏胞布下的“陷阱”,先是一个藏族少年从斜刺里冲了出来,说:我拍了他的牛,向我索要钱。紧接着几个藏族青年也蜂拥上来,异口同声地帮那少年要钱。我一贯讨厌这类挖空心思地布好“饵料”、躲在旁边专等游人上钩的“陷阱”,如果想收钱,就该立一块牌子在牦牛身旁,上面明码标价,愿拍者交钱拍照,如此以牛为“饵”设下“陷阱”,实在有欺骗和讹诈之嫌。我一边和他们理论,一边退上了车。他们不甘心,要上车找我。巴桑起身用藏语说了句话,他们放弃了上车,又去守望下一个目标了。至于巴桑跟他们说了些什么,我一直没问他,也许就是规劝之类的话。

通过这两件事,我总结出,巴桑虽然像我们一样说汉语,也吃米饭,但他的本质仍旧属于他的民族,他的宗教,他的文化。在西藏广袤的大地上,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归属与认同,让他无论到哪儿都能够像纳木错中一尾自由的鱼儿,欢畅地游戏在人群中,即使是面对一条陌生的狗。

在纳木错畔,巴桑陪着我一个人“转湖”,我问他:你不再要一个男孩?他腼腆地笑了,露出一口白如瓷片的牙齿,告诉我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了,很快就要生了,他希望是个男孩。不少藏胞家庭像汉族一样,也喜欢并盼望着男孩,这从他们给自己女儿起的名字中就能反映出来,譬如许多女性的名字中都有“普赤”,意为“招弟”。

在以盛产土豆而著称的南木林县艾玛乡山巴村,我们进村访问了一户藏胞。抬头便看到她家的门头上摆着三副牦牛头骨,进入宽敞的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,楼下喂着牲口,楼上住人。沿着楼梯上去,迎面是一台展开两片光板的太阳能灶,灶头上坐着烧得漆黑的水壶;织了半匹布的老式木制织布机,机旁散乱地丢着梭子。进屋是传统的藏式橱柜,看上去古旧的盛酥油茶的器皿,藏文报纸上晾晒着奶渣。家中只有婆媳俩,男主人去拉萨卖土豆了。老阿妈进进出出忙碌着,一会儿为我们捧上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。在南木林县电视台藏族女记者的翻译下,我们了解了她和村里其他人的生活情况,她们生活得还不错,在村里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不溜儿。在家中,在屋外的阳台上,我们分别与她俩婆媳俩合影。媳妇开始有点羞涩,两只手紧张地绞到一起,慢慢地就放开了,变得大方自然起来。倒是她的婆婆,似乎经过了许多世面,始终一副平静安详的表情,含笑看着我们,仿佛我们不是客人,而是远方来的她的亲人。媳妇与婆婆并肩站在阳光下,与我们逐一合影,红彤彤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意,这是一种不装不做的笑,是从内心开出的格桑花。

送我们出门时,卧在一旁的狗猛地起身,扑上来冲着我们吼叫,她一个箭步上前,挡在了狗的前面。她是怕狗伤害到我们,挺身而出替我们挡住了狗。

我们浑身温暖地记住了这个难忘的细节,记住了她善良柔软的心灵,也记住了她的名字:多吉普赤。

碎碎念

带本字典去旅行



□赵柒斤

喜欢旅游的人,都喜欢带一本书上路。理由虽然千差万别,可结果往往惊人相似:每一次都后悔挑错书。这一点不用怀疑,“偷窥”旅友们的“感受”便能体会一二。我的朋友小白甚至说,每次旅途中看书就像跟那本书打一场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……为此,他常为出门“选”书烦恼。

见小白陷入“带一本什么书出门”的泥潭不能自拔,我便用郭德纲的“语录”开导他:“你出门前找书的无耻样子,颇似我年轻时旅途中扔书的神韵。”谁知那家伙竟死缠着我解释“这是为什么”。其实,5年前的每一次出门,我也被出门前“该选读何书”所困。就在我对旅途读书快要绝望时,一次西安之行的旅途中,一位同事大姐无意中巧解了我的难题。当时我翻了几页自己精心挑选的一本畅销

书就觉得寡淡无味了,便带着书去找同事。几位女同事或靠或躺在火车卧铺上埋头苦读,其中一位大姐津津有味看着的竟是一本字典,这着实让我觉得好奇。一问才知,原来她出门时忘记从包里拿出替儿子买的《汉语小词典》,而带来的两本书又不好看,于是索性就把词典拿出来当书看。我用手中的畅销书“骗”得她的《汉语小词典》后,就爱不释手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如今,提笔忘字和不会写字已成为“长此以往,汉字难存”的揪心话题了。其实,所有中国人和愈来愈多的外国人都知道:每一个汉字都是由偏旁和笔画组成,字形跟字义、字音之间都有一定联系,它是形、音、义的结合体。仓颉造出来的字,不仅融合了字的灵动美观,更糅合进了人的喜怒哀乐。

《新华字典》是我最早接触的一本工具书,依次才分别拥抱《成语词典》、《现

代汉语词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和《辞海》,但对字典有一点体察和洞悉,还得拜旅途所赐。在旅途中,你可以花几秒钟去“识字”,可以用几个小时来“拆字”,还可以花几天时间慢慢“解字”;每个汉字,既能让人“阅读”,又能诱人“悦读”,还能令人“越读”;你既可以把一个字当成一个标题、一个整句来读,也可以将它理解成一个段落、一个章节乃至一部小说来看。所以说,旅途中翻“字典”既不会为情节所缠,又不会为时间所绊,更不会为优劣而叹。

每次,哪怕重新收获一两个汉字,我都会对钱钟书先生增添一分敬佩之情。争相观赏钱先生小说里爱情故事的患者大有人在,但对先生出门、上床乃至有闲就翻字典的爱好,知者却甚少。实际上,在如今这个“提笔不会写字”的网络时代,钱钟书先生喜欢读的“书”,真值得我们去追求。